

明中叶的社会转型与地域空间结构重塑： 以徽州屯溪地区为例

王开队¹ 卢东²

(1.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2.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65)

【摘要】随着明中叶社会转型契机的出现,江南等地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人地关系亦日渐紧张,这影响到其土地利用与区域开发模式等,诸如徽州等一些地区的地域空间结构由此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休歙盆地以屯溪为中心的数十个村落逐渐形成同一市场圈,其区域系统性不断得以加强。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时空计量统计不难发现,经过长时期的变迁,明中叶屯溪一带村落呈现出村落片区密于河谷、疏于山丘的分布形态,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空层次性;至嘉、万之际,大量山丘地带的村落开始入志,表明其村落地域空间结构得以重塑。这一结果既是屯溪地区自身自然与人文环境双重作用的体现,同时也是外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这一大环境作用于区域社会小环境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社会转型;地域空间结构;徽州屯溪;村落;人地关系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1-0109-11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Taking the Villages Distribution Changes in Huizhou-Tunxi Area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WANG Kaidui¹ LU Dong²

(1.Center for Hui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2.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65)

Abstract: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mid-Ming Dynasty, the commodity economy in JiangNan and other places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act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was also becoming increasingly tense, which had affected its land us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consequently,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some areas such as Huizhou had begun to change. During this period, the regional system of dozens of villages centered on Tunxi had been strengthened because they gradually formed the unified market circle in the XiuShe-Basin. B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measurement statistic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we found that the Tunxi Villages in the mid-Ming Dynasty showed a differentiated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villages that densely located in river valleys and sparsely located in hills

【收稿日期】2023-09-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徽州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研究”(20BZS122);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唐宋以来徽州宗族、乡村聚落、宗教信仰的历史地理形成及其演变研究”(22JJD770003);安徽高校协同创新项目“徽州宗族历史地理研究”(GXXT-2020-028);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明代新安江流域人地关系变迁与乡村聚落的时空演变”(2022AH050357)

【作者简介】王开队(1980-),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区域史及文化遗产;卢东(1994-),男,历史学博士,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历史聚落地理学、徽学。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hange, an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ad distinct temporal and spatial hierarchie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Jiajing and Emperor Wanli, a large number of villages in the Tunxi hilly areas began to be recorded in the local chronicles. It shows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villages had been reshaped. This result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dual role of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 simultaneously, it is also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commodity economy on the small environment of regional society.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Huizhou-Tunxi; villages; man-land relationship

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明中叶以来重要的历史现象,由此导致的政治、文化以及诸多社会领域的转型是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重要命题^①。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商业资本雄厚的地域性商帮亦逐渐成形,如徽商便是“构成明代商业资本的一个重要力量”^②，“从成化弘治之际到万历(1573—1620年)中叶的100余年”为其发展阶段^③，“人多地少、山产丰富”的地理环境向来被看作是徽商兴起的重要因素^④，其亦因临近江南、垄断食盐贸易而占据了“市场和商品”上的竞争优势^⑤。徽州商帮的兴起与壮大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徽州社会结构的内在转变，学界多年来对徽商、宗族等“徽州地域社会”要素的复原和解构的重点，也基本在于从历时性解析地域社会结构是如何形成、发展、运行、终结或维系革新。但是，也应认识到，地域社会所包含的空间性和空间范围内的地理现象同样是解释地域社会构成及演变的关键^⑥。就历史时期徽州地域空间结构的演进而言，唐宋以降，徽州山林经济即在我国古代经济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至明代中叶，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以及人地关系日渐紧张的形势下，“向山区进发”是当时徽州人谋求生计的重要手段，徽州的土地利用模式也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将此过程总结为“作物种植从无序到有序，土地权属从分散到集中，土地覆盖从优化到退化”三个阶段^⑦，而这一转变无疑会对徽州的地域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又以与土地利用关系极为密切的乡村聚落（即村落）表现尤为明显。

传统乡村聚落作为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重要物化表现形态，不仅是传统社会以至当下社会基本的组织细胞之一，同时也是认知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和学术意义。较之于学界

① 16世纪以后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大型银矿的发现以及白银冶炼技术的进步等，使得全球范围内作为货币的白银供给大为增加，进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贸易的全球化进程，这也催生了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这与徽商作为商帮的形成以及远距离贸易的实现具有一定的联系（参见熊远报：《会馆·远距离贸易·商业网络——以明清时期北京的歙县会馆为考察线索》，《南国学术》2018年第3期）。不过，目前学界对于这一转型时期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商品经济发展及市镇化等方面，至于这一转型对不同地域社会内部变迁特别是作为农业社会基本载体的村落其影响究竟如何，则探讨的较为薄弱，徽州亦是如此。

② 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

③ 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④ 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叶显恩《试论徽州商人资本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10页）等。

⑤ 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

⑥ 此类研究相对较少，相关研究可参见唐力行、[美]凯瑟·海泽顿《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熊远报《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版）等。

⑦ 赵赞、满志敏、葛全胜：《徽州地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①以及徽州等地市镇社会经济史的长期关注^②,以聚落为窗口考察历史时期徽州的地域空间结构尚有较多研究空白^③。屯溪是历史时期外来移民进入徽州的重要集散中心,明代中叶在外部商品经济发展及内部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等的刺激下,其村落空间分布开始发生重大转变,这一过程较好地展示了社会转型期区域社会自身小环境的空间结构变化,对其展开探讨有助于加深学界对历史时期徽州地域空间结构形成与演变的认知,同时对于理解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大环境与区域社会小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亦大有裨益。

一、明中叶屯溪村落变迁的历史基础

屯溪是当代行政区划中的区(县)级建制,也是一个聚落的泛称,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其涵盖空间范围有所不同。明清及近代,屯溪作为徽州一个典型的市镇,其范围除镇区街市之外,还应包括受它经济辐射的周边乡村,即其“乡脚”^④。市镇和乡脚构成一个市场圈,从这一角度来说,屯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经济区域范围内的聚落集合^⑤。而屯溪作为市镇在地方志中的首次记载出现于明弘治四年(1491)修成的《休宁志》,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徽州府志》、万历三十五年(1607)《休宁县志》对其市镇及周边村落也有详细记载,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段屯溪地区聚落的空间变迁,故本文之明中叶即15世纪末至17世纪初这百余年间。

明中叶徽州的市镇逐渐发展,弘治时徽州府街市绝大多数均在城郭,城外几乎无市^⑥,至嘉靖时府县城外街市有所发展,共6处,分别为歙县“岩镇街、渔梁坝街、大溪桥街”及休宁县“凤湖街、万安街、屯溪街”,其余各县城外皆无^⑦。街市的形成说明明中叶屯溪市场圈初具雏形。这一市场圈的形成离不开新

① 如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包伟民编著:《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滔:《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日]森正夫编著:《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丁韵、胡婧等译,范金民审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等。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邹怡:《产业集聚与城市区位巩固:徽州茶务都会屯溪发展史(1577—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12月;梁仁志:《区域交通、地域商人与商业老街之发展——以黄山屯溪老街为中心的考察》,《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等。

③ 具有代表性的论述如杨春雷:《试论明清徽州市镇与社会转型——兼与江浙市镇比较》,《安徽史学》1996年第4期;唐力行、申浩:《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韩]朴元燾:《明清时代徽州的市镇与宗族——歙县岩镇和柳山方氏环岩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等。

④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乡脚”的概念,早在1936年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进行社会调查时,便注意到开弦弓村等乡村与震泽镇之间通过航船建立起了以震泽为中心的经济联系,在其博士论文中便论述了这一课题(后出版中文本《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载《费孝通文集》第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176—183页)。后在20世纪80年代,费先生在“小城镇调研”的基础上,又以震泽镇与周边乡村关系作为实例,反复强调了这一概念,并阐释和丰富了其内涵(《小城镇大问题》,载《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00—201页)。

⑤ 此处对“历史时期屯溪地域空间”的处理借鉴了后现代地理学“尺度重塑”等思想,“屯溪”的尺度在不同需求、不同认知之下有所不同,我们即以历史范围、当代政区和感知地理等要素“塑合”本文所研究之“屯溪区域”。有关后现代地理学思想,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和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等。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屯溪地区”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黄山设市前的“屯溪地区”是两个概念,具体空间文中已有界定,而有时亦会使用“屯溪一带”的表述,其空间范围与文中界定的“屯溪地区”并无二致。

⑥ [明]汪舜民:《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坊市》,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

⑦ [明]何东序、汪尚宁:《徽州府志》卷1《坊市》,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33页。

安江及河谷盆地赋予的优渥发展禀赋。屯溪位于徽州之中心地带,其地形周高中低,西、南、西南等方向为低山丘陵,北部为高丘陵群,其余则以河谷盆地为主^①。周高中低的地形使其成为聚水之地,横江、率水等河流均在屯溪汇入新安江,其横穿屯溪而过,为屯溪对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天然水道。横江是新安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又名白鹤溪,“发源黟县之吉阳山”,又“过万安、古城岩”,终“至屯溪与南港”相汇^②。“南港”即为率水,是新安江的上源,二水汇聚于屯溪,使屯溪成为徽州腹地重要的水运交通节点。不仅如此,屯溪还为徽州西向陆路交通的重要通道,且其所处河谷盆地平地连片、面积较广,有利于劳动力、原料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为货物加工、集散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水陆交通枢纽集于屯溪,赋予其在徽州绝佳的区位交通优势,面积较广的平地地形使其劳作条件与生产空间较之同期休歙盆地其余市镇为佳,如前述与屯溪并列的岩镇、渔梁坝、凤湖、万安等,或其所依河流不若新安江、或其所处河谷面积较小,区位条件、生产条件与屯溪相差良多。

屯溪较佳的区域条件十分利于商品贸易的发展,元末明初时,率东人程维宗以商贾为业,在商业经营中,“以一获十者常有之,若有神助”,这位颇具经营才能的商人“又于屯溪造店房四所,共屋四十七间,以居商贾之货”^③,说明此时屯溪优越的区位条件已引起人口的集聚。但直至明中叶屯溪作为市镇方才具有一定影响,弘治《休宁志》“镇市”条目下记有“屯溪街”^④,弘治《徽州府志》虽称休宁“贸易甲于他县”,却并未记载“屯溪街”^⑤,及至嘉靖《徽州府志》“屯溪街”方才入府志^⑥,足见明中叶是屯溪由村落转型为市镇的关键时期。为何是明中叶?傅衣凌先生曾论曰:明代中叶,“中国各地曾稀疏地出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的萌芽”“中国的工业原料生产和粮食生产分工逐渐明显”“开矿业发展起来了”“各地都出现有不少的商人,如晋贾、徽商等等”出现了一定意义上工场主购买劳动力自由等^⑦,这些论述较为全面反映出明中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征。明中叶徽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元素,已有学者注意到这类问题,卞利将其总结为:“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以来,随着徽商的大规模外出经营和徽州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迁和转型,传统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也在变迁与转型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法定的正式组织即乡都、里(图)甲、保甲、乡约等和非正式组织宗族、会社等彼此互动,以山区林木以及副产品的生产、加工与贸易为主体、农业生产为辅助的乡村经济结构良性发展。”^⑧这一论断从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社会结构和乡村经济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揭示了明中叶徽州社会经济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对于认识明中叶中国社会的变迁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而明中叶之前屯溪地区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这是探讨明中叶屯溪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变迁的重要前提。

① 黄山市屯溪区地方志委员会编:《黄山市屯溪区志》,方志出版社,2012年,第90-92页。

② [清]何应松:《休宁县志》卷1《疆域·山川》,清道光三年(1823)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年,第41页。

③ 《率东程氏家谱》卷三,明刻本。

④ [明]程敏政:《休宁志》卷5《镇市》,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91页。

⑤ [明]汪舜民:《徽州府志》卷1《地理一·坊市》,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本。

⑥ [明]何东序、汪尚宁:《徽州府志》卷1《坊市》,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本,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⑦ 傅衣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⑧ 卞利:《变迁、结构与转型:明清徽州的乡村社会》,《理论建设》2015年第5期。其他有关明中叶徽州社会变迁的讨论,还可参见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唐力行:《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王廷元:《论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徽州地区之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卞利:《明代中后期至清前期徽州社会变迁中大众心态研究》,《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先秦至东汉末年,徽州一带为山越聚居,汉建安十三年(208)贺齐进剿山越,战后“分歙为始新、新定、黎阳、休阳”^①,屯溪即为黎阳县境核心区域。通常来说,“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②,山越人能够与孙权割据势力进行抗争,表明包括屯溪在内的徽州一带已有相当的开发基础,这也构成了设县的基本条件。此后至南朝,黎阳县两经废立,最终并入海阳县,原因可能主要在于海阳县治处于河谷盆地与山区的交切线,更易于政府治理、弹压地方和军事守备^③。至隋唐时代,从名刹古寺和人口数量可见彼时屯溪发展之端倪。屯溪域内的新屯寺“在黎阳乡合阳里,唐贞观十年(636)建”,“齐祈寺在和睦乡太清里,唐会昌中建”,此外还有“游山庙”等^④,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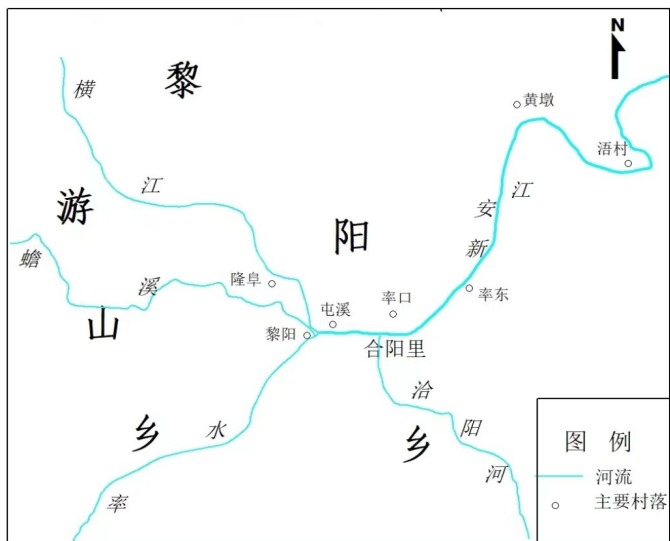


图1 南宋屯溪乡里及主要村落分布示意图

注:据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黄山市屯溪区志》所附《屯溪区行政区划图》改绘

齐祈寺之后还为程氏宗族的家庙^⑤,这些寺庙多集中于屯溪中东部河谷盆地之中。唐元和间徽州总户数为16754^⑥,以六县计则各县平均约2800户。宋时休宁县共十一乡六十里,屯溪地区大致为黎阳乡和遊(游)山乡所在,两乡之下各有五里^⑦,共十里,占休宁全县里数六分之一。太平兴国中(976—983)徽州“皇朝户主四万八千五百六十,客三千二百三”^⑧,总户数为51763,平均各县8627户,则休宁县各里平均约144户,屯溪地区的十里即1440户;乾道八年(1172),休宁县有“主户万九千五百七十九”^⑨,各里平均326户,则屯溪地区有3260户,较之太平兴国时的户数两倍有余,几为唐元和间一县之户数,由此可见迟至南宋时屯溪地区已发展至相当水平(图1)。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新安大族志》开始修订^⑩,《大族志》不再按照里来编排,已记有屯溪地区“率口、闵口、塘尾”等村落,由此可推知此时屯溪地区的村落较前代有所发展。至明洪武十八年(1385),休宁县设置十二乡,三十三都,编户一百六十里,较南宋时增加了百里之多,屯溪一地的两乡析为四乡、共置八都^⑪,表明其地域开发较之前代更为充分。

① [宋]罗愿:《新安志》卷1《沿革》,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02页。

② 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载《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4页。

③ 唐力行、[美]凯瑟·海泽顿:《明清徽州地理、人口探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④ [宋]罗愿:《新安志》卷4《休宁·僧寺》,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51页。

⑤ 屯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屯溪市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页。

⑥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28,贺次君点校,《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1983年,第686页。

⑦ [宋]罗愿:《新安志》卷4《休宁·乡里》,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46页。

⑧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2059页。

⑨ [宋]罗愿:《新安志》卷4《休宁·户口》,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八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46页。

⑩ 朱万曙:《〈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⑪ [明]程敏政:《休宁志》卷1《隅都》,明弘治四年(1491)刻本,北京图书馆图书出版编辑组:《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2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470页。

依上言之,便捷的水陆交通及面积较广的河谷盆地为屯溪提供了较为优渥的区位优势与发展条件,但这种优越条件在自然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小农社会长期未有充分显现,直至明中叶在中国社会经济整体转变的宏观背景下,屯溪市镇经济才逐渐活跃起来,由此影响到其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变迁。

二、明中叶屯溪地区的村落发展

明中叶随着社会转型契机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区域社会结构亦有所转变。然而,任何社会结构无一不建立在地表空间之上。作为人地关系地表空间的折射,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差异也往往被视为地表空间地域化的重要原因,其也因此成为识别、界定地域空间范围的重要依据。由此言之,地域的历史结构不但包括其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还应包括其空间结构。目前学界对地域结构变迁的社会视角已有相当程度的重视^①,而通过讨论地域建构过程中某些空间要素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似可更进一步地认识“地域”本身及其演进过程。聚落,作为地域社会发展的重要物化表现形式,其分布和形态相对集中地展现了地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为讨论地域空间结构提供了可能。

屯溪地区的村落作为传统农业社会人类生存繁衍和各种社会关系联系最紧密的空间单元,其变迁亦有其内在规律。如前文所述,我们可大致了解明中叶之前千余年屯溪区域开发之概貌,而明中叶屯溪村落体系无疑是这一变迁过程的延续和结果。那么,延至明中叶屯溪之聚落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明代数部徽州府、县志对乡里之下的村落记载较为详细,我们可以依据嘉靖《徽州府志》、万历《休宁县志》的相关记载来复原这一时期屯溪村落的基本分布格局^②,以此反映这一时段屯溪地区乡村聚落的基本空间变迁,兹据二志制表如下:

表 1		嘉靖《徽州府志》、万历《休宁县志》所载屯溪乡都村图数量对比表					
乡	都	嘉靖《徽州府志》		万历《休宁县志》		新增加的村、图数	
		村数	图数	村数	图数	村数	图数
黎阳西乡	十四都	7	11	11	11	4	
	十五都	2	5	2	6		1
黎阳东乡	十六都	9	7	9	8		1
	二十一都	5	5	5	5		
	十八都	6	11	7	12	1	1
由山东乡	二十二都	3	8	4	8	1	
	二十三都	4	9	4	9		
由山西乡	十七都	5	7	8	7	3	
	二十四都	8	7	8	7		

① 历史人类学尤为注重“社会结构”及“结构过程”,也十分重视对结构的“解构”分析,如赵世瑜便认为历史人类学方法对理解区域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参见赵世瑜著:《在空间中理解时间 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② 一般来说,不同层级政区空间尺度的方志材料对于其社会要素的记载在详略程度上往往是有差异的。本文之所以选择府志与县志进行比较,主要原因是由于嘉靖《休宁县志》(国家图书馆藏本)中对乡都图的记载并未涉及具体村落,而嘉靖《徽州府志》中对都图之下村落的记载较为详细,同时考虑到本文研究的空间尺度较小,不同层级的地方志书可能存在的漏载等情况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影响可能也较小,故最终选择嘉靖《徽州府志》与万历《休宁县志》进行比较分析。此外,由于本文所依据府、县二志编纂前后相继,且明代休宁为文教发达之地,地方志中对于同类社会要素的记载大致具有连续性,入志标准理应会遵循一定的共同准则,这也是我们可以对其入志村落进行数据比较的重要逻辑。

续表1

二十五都	6	7	7	7	1	
合计	55	77	65	80	10	3

资料来源:嘉靖《徽州府志》卷一《厢隅乡都》、万历《休宁县志》卷一《舆地志·隅都》。

依上可见,嘉靖《徽州府志》中共记载屯溪地区55村、77图,万历《休宁县志》中则有65村、80图,其村落呈差异化分布。从这一时段村落的数量来看,由山西乡最多,黎阳东乡、由山西乡居中且相近,黎阳西乡最少;再观各都的村数,十四都、十六都、二十四都等相对较多,其余都的村落数量比较平均,十五都村数相对较少。村落的数量反映出其大致的分布情况,而“图”^①则可大致反映出户口数量,进而体现出村落的人口规模。从各乡都的图数来看,由山东乡、由山西乡较多,黎阳西乡次之,黎阳东乡较少;从各都的情况来看,十四都、十八都较多,其余各都比较平均。而从村落数量的增长来看,万历《休宁县志》较嘉靖《徽州府志》多出10村^②,约40年的时间屯溪地区新入志村落数量增长近二成,较之汉唐以来千余年的变量而言,这一时期无论是其增量还是其增速无疑都是极快的,到底是何原因引起这一重要变化,理应值得特别探讨(下文详述)。这类村落分布相对集中,其中北村、古楼、厚村、方山等4村分布于十四都,易村、山头、合干等村分布于十七都,奕洪、朱村分别位于十八都和二十五都,这些村落均位于山丘地带,可见该地的村落在嘉、万时期取得了较大发展。此外,十五都、十六都和十八都分别新编1个图,这些都多位于江河沿岸的河谷盆地,如十六都大部位于新安江干流沿岸,其河谷盆地较为平旷开阔,十八都亦有沿河谷地,但其河谷面积相对狭小,十五都的村落较为集中分布在横江河谷和高丘陵群的交汇地带。要之,嘉、万时期屯溪山区的村落发展较快,而河流谷地图数的增加则表明了其地域开发和人口增长的持续性。

综合两部方志中关于村、图的数量统计,可以发现各都村、图比例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十六都村多图少情况最为明显,十四都、十七都等也由嘉靖时的村少图多转变为万历时的村图相等和村多图少,一定程度上表明十六都的村落可能人口较少、村庄的规模相对较小,十四都、十七都新入志村落的规模应该不大。其余诸如十八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等均显现出村少图多的特征。故整体来看,嘉、万时屯溪地区十六都等东部河谷盆地一带可能村落数量较多但规模相对较小,二十二都等中西部沿水河谷、二十三都等西南低山丘陵地区则可能村落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原始状态下村落分布的“散村倾向”。“散村与集村”是村落分布的主要形态^③,二者主要区别在于民居及其生产资料之间呈现“集聚、靠近的倾向,还是表现出离散的倾向”^④,虽然经过千余年的稳定的持续发展,但仍然基本以小规模的散村占据主导地位^⑤。屯溪地区生产资源相对集中于河谷盆地,故该区域村落分布较为稠密,而在自然经济和小农社会环境下,劳动者单独占有自然资源、生产资料的需求和欲望又使得村落分

① 图即是里,110户为一里,因地方志等材料均称都图,故下文统一称为“图”。关于徽州乡村建置的探讨可参见周绍泉:《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卞利:《明清时期徽州的乡约简论》,《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卞利:《论明中叶至清前期乡里基层组织的变迁——兼评所谓的“第三领域”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郑小春:《里老人与明代乡里纷争的解决:以徽州为中心》,《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黄忠鑫:《在政区与社区之间——明清都图里甲体系与徽州社会》,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等等。

② 嘉靖《徽州府志》和万历《休宁县志》记载的是县级政区所辖都图体系之下的村落,尽管可能并非该时段内新形成的自然村落,但也非所有村落均可被载入地方志中,入志的村落亦应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其参照标准之一应是税赋,各都均标明图数,由于其记载的村落组织化和系统化相对明显,故而大致能够反映出当时屯溪地区村落的整体变化及分布态势。

③ 陈芳慧:《村落地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第69-70页。

④ 鲁西奇:《汉宋间长江中游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载《历史地理》第二十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⑤ 鲁西奇:《散村与集村:传统中国的乡村聚落形态及其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布相对分散,此即为十六都等处于开阔河谷地带的村落数量多但规模反而较小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都图体系下,明中叶屯溪地区的村落呈现出差异化分布的态势,十四都、十六都、二十四都等村落数量相对较多,十五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等则相对较少,就其增长速度而言山丘地带的村落增速较快。从地方志中记载的村、图比例差异可以看出此时屯溪中部新安江沿岸和低山丘陵地带的村落户数较多、规模较大,而东部沿江村落虽然数量较多,但规模相对较小。这一现象也体现了传统农业生产条件下屯溪村落分布的“散村倾向”,但随着区域开发的深化和村落数量的增多,屯溪地区的村落分布随之出现了明显的集中倾向。

三、明中叶屯溪村落的分布演变及其社会驱动

明中叶屯溪一带村落的分布态势显示出自然环境对于村落分布的影响,而村落规模的迥异则反映出不同地区人群对于自然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虽然明中叶屯溪一带的乡都幅员并不大,但各乡都的地形地貌却有很大差别。总体而言屯溪一带的地形地貌大致可分为沿河谷地和山丘地带两大类型,河流主干沿岸的河谷较为宽阔,如在横江沿岸及率水、横江交汇的河口处便形成了地势较为平坦、开阔的河谷盆地,而河流上游如率水沿岸的河谷面积则相对狭小,河流未经过的地区多为山地和丘陵。河谷、山地间杂分布于各都,故一都之内也存在一定的地形差异,如十四都、十六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等主体部分位于平旷开阔的河谷盆地,但其内部也存在着山地、丘陵等;十七都、十八都、二十三都等内部虽然广泛分布着低山丘陵,但率水、横江等江河也穿其而过,故也间隙有河谷分布;甚至以高丘陵群为主要地形的十五都,其西部也有横江水域带来的河谷地形。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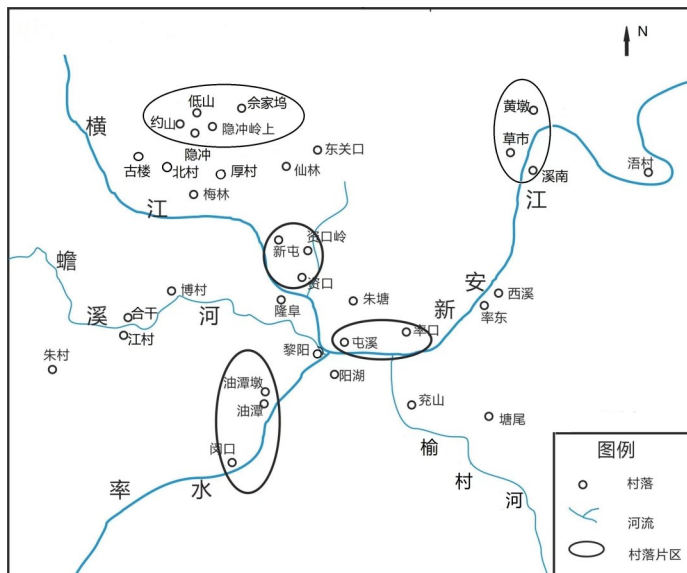


图2 明中叶屯溪村落分布示意图

注:据方志出版社2012年版《黄山市屯溪区志》所附《屯溪区行政区划图》改绘

是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环境的影响,各都的村落数量、人口规模才会呈现出差异化的分布态势。那么,明中叶屯溪一带的村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分布态势呢?其中可据嘉靖《徽州府志》及万历《休宁县志》制图2:

依图2可见:明中叶屯溪村落整体呈现出既相对集中又整体分散的片区状分布态势,集中于河谷盆地而疏于山地丘陵,河谷盆地之村落多呈片状分布,而山地丘陵之村落则多呈点状分布。这一分布结构的形成与历史时期屯溪地区的宗族迁徙和层次性开发具有密切联系。徽州“乡社名目多起于晋、唐、宋,家有祠、宗有谱,一姓相继,百世不迁”^①,由是在徽州社会长期稳定状态下^②,一个宗族在某地的聚居繁衍必然会推动该地的开发,进而会影响该地聚落的形成和发展。因而,族居地作为人口流动及地域开发的

① [清]丁廷樾修、赵吉士撰:《徽州府志》卷1《舆地志上·厢隅乡都》,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中国方志丛书》237,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306页。

② 唐力行认为宗族组织、理学及科举儒业、徽商这三个要素在徽州区域内外的良性循环是徽州乡村社会稳定存续的关键所在,参见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16页。

重要现象和结果,其为学界讨论明中叶屯溪地区村落空间分布状态的原因提供了重要线索。《新安名族志》由徽州乡贤戴廷明、程尚宽等编撰,是区域化的“徽州宗族总谱”,为复原明中叶屯溪地区的族居分布和变动提供了基本的资料来源。那么,这类材料的可信度有多高呢?历代族谱编修出于各种原因自有其不可信之处^①,不过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所言“谱牒之不可靠者”在于其记载的“官阶、爵秩、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等崇祖荣祖的内容,而史学研究所需要的如“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等信息,“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这类信息自不必虚构^②;再者,《新安名族志》较于专记某一家族的谱牒,其“志一地方之族姓,虽不能云谓全无缺漏,要可以十得其八九”^③,从其所载的信息及考虑到其修撰过程中各要素的影响,其中关于宗族聚居及迁徙的信息应当是相对准确可靠的,可成为探讨徽州宗族发展的基础性材料之一^④。根据是书内容,可编制下表:

表2 明中叶屯溪地区名族聚居地分布表

族姓	族居地	族姓	族居地
程	塘尾、溪西、屯溪、会里、闵口、瑶关、油潭墩上(高枧)、率口、汪祁、中泽、荪田、浯田、芳关、北村、泰塘、隐冲岭上、低山、东关口、率东、仙林、瑶溪、霞阜、蟾溪、汪干	徐	资口、古楼
		胡	柏树坑、霞富
		郑	新屯
		金	潜阜
汪	潜阜、资村、上资村、梅林、尧山、中泽、居安、洪方、阳湖、石砵、藏溪、富昨、隐冲	洪	黄石
		李	阳湖
孙	黄墩、溪南、坑口、草市、阳湖、埭山、溪东、沙园、浯田	任	古楼下
		何	率口
朱	浯村、溪南三坪、星州、月潭、资口岭、新屯	项	闵口
黄	居安、星洲、约山、黄川(黄村)、商山	毕	闵口
吴	上山(商山)、吴田、油潭、博村、朱塘、雁塘	沈	闵口
叶	闵口、星洲、朱村	谢	安岐
戴	隆阜、新屯、油潭	潘	屯溪
范	博村、林塘	曹	草市
许	孚潭、油潭枫山	詹	流塘
江	黄墩溪南、石佛	余	余家坞

资料来源:(明)戴廷明等:《新安名族志》,朱万曙等点校,黄山书社,2007年。

① 目前谱牒资料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已获得学界的充分肯定,如冯尔康《家谱的学术价值及其研究的现实意义》(《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合刊)、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遗产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等相关讨论均认为谱牒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社会和现实价值,有关族谱记载内容中可信度较高和可能存伪的辨析也较为深入,如刘志伟《明清族谱中的远代世系》(《学术研究》2012年第1期)认为族谱可以“窥探明清以来世态风习之流变,断不可用以为古史考辨之证据”,王鹤鸣《家谱的价值与弊端》(《上海教育》2006年合刊)、张廷银《族谱资料与底层文士对古代文学的批评——兼及族谱资料的真实性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等也总结了谱牒资料中相对不可信的部分。

②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③ 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载《长水集》(上),第344页。

④ 关于该志的相关研究参见[日]多贺秋五郎《关于〈新安名族志〉》(刘森译、傅衣凌校,刘森编:《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第96-124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41页),赵华富《〈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朱万曙《〈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朱万曙《〈新安名族志〉的版本及其史料价值》(《文献》2005年第1期),章毅《迁徙与归化——〈新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载《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王日根、曹斐《秩序的确立:〈新安名族志〉的编撰与意义》(《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等。

从表中统计结果可知,名族的聚居地点多于同期地方志中记载的村落,这是因为族民地可能与方志中记载的村落有所差异,如“油潭墩上”“黄墩溪南”等均是一定地域范围的概称,其对应的村落很可能是“高枧村”“溪南村”等,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族居地为自然村落但尚未达到一定标准而未被志书记载。《新安名族志》共记约27个宗族迁入屯溪聚居、繁衍,自隋末至明初几无间断,以唐末、两宋较为频繁,之后则呈现出愈加稳定的态势,尤其在进入明代后,屯溪地区的族居已经相对稳定下来,因此《新安名族志》中记载的族居地也大体表明了明中叶徽州名族的地域空间分布。据上表可知,明中叶屯溪一带名族族居地多位于新安江水系的河谷盆地,如程氏聚居的塘尾、屯溪、闵口等,汪氏聚居的阳湖、洪方等,孙氏聚居的溪南、草市等,均位于新安江干流的河谷地带,其他名族族居地如博村、隆阜、新屯、潜阜、资村、藏溪、充山、蟾溪、合干、安岐等则分别位于新安江支流横江、榆村河、蟾溪河沿岸。江河沿岸河谷地带的生产、生活资源较为优渥,这是吸引宗族人口来此聚居的重要基础。《新安名族志》所载主要族居地可与前述方志所载明中叶屯溪村落空间分布态势相印证,前述村落屯(溪)率(口)片区、油(潭)闵(口)片区、新(屯)资(口)片区等多集中在新安江干、支流沿岸,低(山)约(山)片区虽相对集中分布于高丘陵群与河谷盆地的结合地带,但其依然靠近横江水域。与之相对应的是,屯溪西部主要地形为低山丘陵,虽有如程氏聚居的合干等地,嘉靖后亦有进士、乡善、孝子等闻于朝堂乡野^①,但其村则直至万历《休宁县志》方才入志,说明其在明前中期规模与影响可能尚还有限。

从名族聚居地的时空变动来看,宗族繁衍所形成的人口压力应是徽州山丘地带得以持续开发的重要内在原因,同时,明中叶商品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也为徽州山区的深入开发带来了重要机遇。在地理环境的制约和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徽州民众在山区主要种植、经营茶和漆等经济物产,而这种开发模式能够长以为继,既与明中叶以后市场需求大增有关,更得益于徽商市场网络的运作^②。徽人大规模从事山区经济作物种植,就食于商等缓解了区域人口压力,同时商业利润也反哺徽州本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山区人口对粮食种植的依赖,为人口长期在山区聚居、生存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推动了嘉、万时期屯溪地区山丘地带的村落发展。如十四都新入万历《休宁县志》的北村,约在元中期后便有程氏族人来此聚居,但其直至万历时才被记入县志中,可见北村取得较大发展的时段为明前期。这支程氏的始迁祖为“念五”,入明后,其曾孙程仲芳受“乡民荐举,金掌五保竭首”,其家亦较为富足,“税甲一乡”,其兄仲仁之子程懽却并未在乡务农,而是外出“为盐商”^③。再如十七都新入志的江村,为洪氏所聚居,据其家谱载,弘治、嘉靖后其族人经商务迹方渐趋增多,如二十五世九惠(1488—1530)家资颇丰,其人也“慷慨豁达、和亲睦邻”,然“享年弗永”,遗孀守节,并“抚持四子至于成立,基业日隆”;德贵(1493—1572)“少失怙恃,及长勤俭,兴创业,日殷富,克自树立,族党称之”;还有二十六世仁荣(1518—1589)“少年丧母,笃孝其父,偕幼弟以经营创业”^④等。上述新入志村落商人在族谱中的大量出现显然值得注意,这不仅说明从商行为(包括本地土产商品贸易及在外行商等)已经在这一时期入志村落中广泛存在,而且确实对所在族居村落的发展提升起到了一定作用,才会有“税甲一乡”“族党称之”之誉。

就此而言,明中叶屯溪人口移居山区和经商均属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系列反应,二者互为支撑,共同促进了屯溪地区山丘地带的深入开发,山区村落由此大为增加,部分山区村落的影响力也随之提升,以至入志,从而使得明中叶屯溪地区乡村聚落的地域空间结构得以重塑。

余 论

明中叶屯溪地区村落的地域空间结构呈现出相对分散而又小范围片区集中的分布态势,其空间结

① [明]曹嗣轩编撰,胡中生、王夔点校,周伟元审订:《休宁名族志》,黄山书社,2007年,第120页。

② 赵赞、满志敏、葛全胜:《徽州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③ [明]曹嗣轩,胡中生、王夔点校,周伟元审订:《休宁名族志》,第128页。

④ 《江村洪氏家谱》卷6《江村世系表》,清雍正八年(1730)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构具有鲜明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新安江水系的河谷盆地,其地域开发和村落发展的时间最早,唐宋时代大致奠定;第二层次为低山丘陵地区,元至明初发展较为突出;第三层次则为高丘陵群,开发力度相对较小,发展时间较晚。而至明中叶嘉、万之际,山丘地带也有若干村落得以入志,表明其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由此改变了屯溪地区乡村聚落的地域空间结构。屯溪地区生产资源的空间差异是造成村落片区集中分布在河谷盆地的基本原因,但至明中叶相对尖锐的人地关系则使得山丘地带的村落人口在适应生产空间和转变生产方式后,主动融入外部商品经济发展潮流,选择茶、木等作为山区的主要作物。由此,山地开发和外出经商成为这一时期徽州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人地关系持续紧张致使更多徽人向山区进发、加大山区垦殖的力度,抑或选择外出经商;另一方面,大量外出经商的徽人也将外地市场需求与徽州土产连接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徽州山区土产的商品化^①。因此,这一村落地域空间结构的形成无疑是屯溪自身自然和人文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外部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这一大环境作用于区域社会小环境的具体体现。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转型契机的出现,诸多经济功能突出的市镇逐渐兴起是其在地表空间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些市镇与传统城镇相比,往往承担的政治功能相对薄弱,其经济发展模式可视为传统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故很多讨论集中于市镇本身的经济发展和辐射机能以及跨区域的对比分析等,而“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②。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市场理论对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影响重大。明中叶屯溪以其地理环境和区位条件的优越性而发展为贸易功能突出的市镇,但商品集散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与中心地理论和施坚雅模式相去甚远,即屯溪与徽州地区的城乡聚落更类近一种线性的双向贸易联系,未能构建相应的城镇与乡村市场层级体系,这也是由徽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徽州地区不具备施坚雅模式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不平均分布的人口、以流通枢纽为主要作用的市镇等,使得徽州地区缺乏形成均衡市场体系的人文环境。当然,中心地理论和施坚雅模式对我们认识徽州地区市镇与乡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仍然有一定的意义。譬如,在相当长的时段内,屯溪以货物集散为主的贸易方式难以与徽州的城乡聚落产生稳定而具有层级性的经济联系,也难以在地域空间上形成明确的“核心—边缘”结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规模的扩大,施坚雅所谓“市场原则”的作用逐渐凸显,屯溪与周边城乡聚落的经济往来日趋加强,至清后期屯溪发展为“茶务都会”,在以茶叶等为主要外销物产的贸易格局中,屯溪经济中心的地位逐渐确立和巩固^③。

历史时期在民众寻求生存空间突破的过程中,通常会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社会关系及社会结构,这些活动作用于物理空间的结果和表现亦同样重要。从明中叶的屯溪来看,聚落发展的内在动力主要在于区域内人口日渐增多而带来的生存空间拓展需求,在外部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转型刺激下,距离河谷盆地水陆码头较近的山丘地带首得其风,而无论是山丘地带村落经济作物的种植还是从商之风的日渐盛行,都为山丘地带村落的发展注入了更多活力,这不仅使得屯溪一带的地域空间格局得以重塑,同时,也为其后屯溪在徽州的超越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由此看来,明中以后江南等地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形态变迁等社会转型带来的发展机遇,不仅为江南等地传统市镇的勃兴以及近现代城市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也使得处于内陆的徽州府域人地关系及地域结构产生了重要变化,这无疑为学界探讨明中叶以来中国东南区域历史发展的内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样本。

(责任编辑:李良木)

① 赵赟、满志敏、葛全胜:《徽州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1500—1900)》,《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② 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③ 关于屯溪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过程,可参见邹怡《产业集聚与城市区位巩固:徽州茶务都会屯溪发展史(1577—194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12月。